

从何家村窖藏的金银器制作工艺看粟特人在中国丝绸之路的影响力

居宇萌

香港教育大学, 香港 999077

摘要: 本文以何家村窖藏金银器为研究对象, 探讨粟特人在丝绸之路的文化影响力。何家村窖藏于1970年在西安发现, 含大量唐代珍宝, 其中金银器工艺精湛, 代表唐代最高水平。粟特人在公元3-8世纪沿丝路内迁, 掌握路上丝路贸易, 带来了独特的金银器工艺。通过分析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的鸳鸯莲瓣纹金碗、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与兽首玛瑙杯, 可见粟特文化对这些金银器工艺与纹饰的影响。这些金银器印证了唐代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 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物。

关键词: 何家村窖藏; 金银器; 粟特人; 丝绸之路; 文化交流

1 引言

丝绸之路是亚欧大陆上延续千年的一条连接东西方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的“神路”。唐代的经济繁荣、政治强盛、文化丰富, 让丝绸之路在国际历史舞台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也成为中国历史的闪光点。唐代金银器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物质载体, 见证了大唐盛世和丝绸之路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其中何家村窖藏的金银器最具有影响力, 也代表了唐代金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民间有: “一个何家村, 可以买下半个香港”的说法, 虽略带夸张, 却凸显其珍贵。何家村窖藏中出土的金银器, 包括38件金器和216件银器, 在工艺制作上表现出超高的手工艺术^[1]。公元3-8世纪, 被称为“昭武九姓”的粟特人结成商队沿丝绸之路大量内迁^[2], 堪称“中国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贸易的担当者”^[3]。他们在带来域外商品的同时, 也将高超的金银器制造技术传入中国, 其中包括锤揲、镌刻、焊接、金珠等。本文试通过对鸳鸯莲瓣纹金碗、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以及兽首玛瑙杯的分析, 探讨粟特文化如何影响何家村窖藏金银器的制作工艺, 进而体现粟特人在中国丝绸之路的文化影响力。

1.1 窖藏的发现与金银器

1970年10月5日, 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中的两个陶瓮和一个提梁银罐在一次基建施工中被意外发现, 上千件唐代珍宝重见天日。关于窖藏的由来, 学界目前存在多种说法: 一种观点认为, 唐末战乱时, 德宗朝租庸调使刘震将珍宝藏于家中地窖, 此说法由齐东方提出, 依据来源于唐代传奇小说《无双传》, 但也有学者指出, 目前尚未找到与“刘震”对应的真实历史人物, 证据链尚不完整^[4]; 另一种观点认为, 窖藏是唐少府监下属单位因战乱集体掩埋的官方财物。可以确定的是, 这批珍宝是受

战乱影响后被集体掩埋的。

在这些唐代珍宝中, 金银器最引人注目。唐代社会对金银器的重视程度极高, 甚至流传“食器用金银, 可不得死”的观念, 使得人们对金银的追求达到狂热程度。最初, 金银器仅为少数上层贵族占有, 是等级身份的象征; 同时, 金银器作为贡品, 进贡者可获得皇室保护, 也成为“统治阶级笼络人心、巩固君臣关系的润滑剂, 以及各级官吏邀功取宠、博取帝王恩泽的供奉品”^[5]。因此, 研究这些金银器, 能够透过器物表象, 深入了解唐代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

1.2 粟特人在丝绸之路

唐代的丝绸之路主要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本文着重探讨陆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 途经河西走廊、西域, 最终到达中亚、西亚和欧洲。丝绸之路本质上是文化交流的空间, 其中宗教对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唐代对宗教开放的态度, 使得唐代艺术呈多元包容的风格。

公元3-8世纪, 粟特人活跃于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上, 在商贸、政治和文化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常以商队的形式东迁, 规模可达数百人, 并在沿途建立聚落。为了管理和控制胡人聚落, 唐朝中央与地方政府专门设立了萨保府对胡人聚落进行监管。从撒马尔干到长安, 甚至远至中国东北边境, 粟特人已构建起庞大的贸易网络, 经营香料、贵金属、布匹等货物^[3]。从北朝到隋唐, 粟特人几乎掌握了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

在文化交流中, 粟特人扮演着东西方文化使者的角色。唐朝的许多舶来品, 多由粟特人从西方转运而来。薛爱华教授曾将唐朝的外来物品比作“撒马尔干的金桃”^[6]。同时, 他们还传播祆教与佛教, 其衣着风格也影响了唐朝

的时尚追求。

2 金银器的制作工艺

2.1 鸳鸯莲瓣纹金碗

作为极少见的唐代纯金食具，鸳鸯莲瓣纹金碗在何家村窖藏中共出土两件，其制作工艺精湛，运用了锤揲、镌刻、焊接、金珠等技术。器物纹样以双层莲瓣纹为主，该纹样本为佛教艺术审美中的典型图样，后融入粟特文化，成为粟特金银器的独特装饰风格。

鸳鸯莲瓣纹金碗是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典型例证：双层莲瓣装饰上，刻有中国独特的鸳鸯、鹿、鸭等珍禽异兽以及忍冬花草，碗底镌刻宝相花纹样，并用小联珠缀饰；碗内壁分别墨书“九两半”“九两三”，标注了金碗的重量。这种多瓣装饰由粟特工匠传入中国，公元5世纪到6世纪，粟特人的锤揲技术已经很成熟，其器物常以大量的凸鼓的多瓣纹作为装饰^[7]。为契合中国人的审美偏好，唐代工匠将多瓣纹改造为莲花瓣形，线条更显细腻流畅。莲花瓣纹样多见于佛教造像的台座中，应用于金银器后，呈现出中饱满蓬勃的视觉效果，且纹饰更为平整，不显突兀。值得注意的是，7世纪后半叶，这种双层莲瓣装饰风格甚至反向影响粟特地区，出现了非传统莲瓣纹的粟特银碗，体现了文化交流的双向性。

2.2 鎏金仕女纹八瓣银杯

鎏金工艺始于战国，是中国古代工匠智慧的结晶。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不仅运用了鎏金工艺，还融合了具有粟特风格的波斯纹饰，生动反映了唐朝宫廷中的狩猎、驯兽、赏乐文化，同时可窥胡人内迁后，唐朝驯兽文化的发展、女性地位的提升及艺术审美的变化。

银杯内底饰有海水纹，中央镌刻摩羯纹；器物整体呈内凹外凸的造型，齐东方先生考证其制造时间为8世纪前半叶^[8]。杯身主体绘有四幅狩猎纹与四幅仕女纹：狩猎场景中，猎手或拉弓射箭，或手握猎鹰追逐野兔，或与猛虎搏斗，或高举棍状器物；仕女场景中，仕女姿态优美，或颌首垂袖，或挺拔坐于方凳，或手执团扇、拇指翘起，或弹奏琵琶、吹奏笙管。

若细究唐代纹饰的艺术表达，会发现“胡风”的呈现颇具特色，它主要通过狩猎纹与动物的互动场景来展现。如追野兔、架鹰以及斗虎等情景，这与粟特人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胡人（尤其是粟特人）从西方迁入中国时，将驯兽狩猎技艺带到中国，深刻影响了唐代驯兽文化，懿德太子墓中的《驯豹图》和《狩猎出行图》便印证了这一点。图中胡人成为唐人狩猎的助

手，展现了猎豹驯养的场景^[9]。而仕女图以仕女为核心，而非侍从或乐师，反映出在武则天时代女性地位的提升，当时女性可参与骑马射箭等原本由男性主导的活动，也体现了唐代艺术审美对女性形象的重视。

2.3 兽首玛瑙杯

兽首玛瑙杯是何家村窖藏的珍藏品，它制作精美，运用焊接、兽首镶金等技术手法，使兽首的造型更加惟妙惟肖。该器物象征权力和财富，结合唐代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及朝贡制度，推测其很有可能是域外进贡给唐朝皇帝的贡品。

兽首玛瑙杯的造型源自西方的象牙“来通”，“来通”是一种呈漏斗状的饮酒器，兼具饮酒与向神致敬的功能^[10]。其造型设计很奇特：兽首的角为羚羊角的形态，但面部却呈牛的轮廓；在西方文化中，羊常被视为神的象征之一，因此对羊的刻画更为庄重^[11]。器物所取材料是条纹状降红色的玛瑙，这种红色玛瑙在中国较为罕见，主要产于中亚、西亚（尤其是波斯）等西域地区。历史记载显示，古代康国、波斯、吐火罗、渤海国等均曾向唐朝有进贡玛瑙，《旧唐书》中亦有“开元六年，（大康国）遣使贡献玛瑙杯”的记载。此外，何家村窖藏珍宝本属唐代宫廷藏品，原藏于大明宫的琼林库^[12]。窖藏中还出土了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日本和同开珎等域外钱币，进一步佐证了兽首玛瑙杯作为朝贡物品的属性，是唐代朝贡贸易的见证者。

3 文化影响力体现

3.1 推动唐代金银器工艺革新

何家村窖藏中出土的金碗、银碗以及玛瑙杯等，均展现出鲜明的粟特风格。其纹饰与造型清晰表明，粟特匠人的技艺和审美已对唐朝的器物制作产生直接的影响。唐代少府在金银器的制造过程中，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吸收粟特等域外工艺的精髓，将粟特风格的带把杯造型和素面器物的技术与中国传统锤揲、焊接、抛光等技术相融合，使从金银器制作工艺从单一的传统模式，转变为多元素交叉的跨国融合模式。因此这种工艺融合为唐代金银器工艺的革新提供了重要的域外技术支持，推动唐代金银器制作达到历史巅峰。

3.2 强化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双向互动

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中间商，粟特人的文化元素通过何家村窖藏金银器实现了跨国传递，进一步强化了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双向性。一方面，何家村窖藏中粟特风格器物的存在，有力地证明了粟特文化通过丝绸之路东传至中原，

并融入唐代文化体系,成为唐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丝绸之路不仅促进了商品贸易,更作为文化传播的桥梁,使各种文化元素得以广泛传播和交流。另一方面,唐代少府监在吸收粟特工艺后,创作出兼具中外元素的金银器,这些融合了多种文化风格的器物又可能通过丝绸之路反向传播至西域乃至更远地区。这种“粟特文化东传—唐代融合创新—文化反向西传”的双向交流闭环,使得丝绸之路超越了商品贸易通道的范畴,成为文化交融的核心通道。这种跨文化交流并非单向输入,而是通过互动、适应和创新,形成更丰富的文化形态,推动东西方文明共同发展。

3.3 奠定唐代在丝绸文明交流中的核心地位

何家村窖藏金银器所体现的粟特工艺融合成果,彰显了唐代强大的文化吸纳与创新能力,奠定了唐代在丝路文明交流中的核心引领地位。当时,唐朝通过少府监整合包括粟特在内的域外工艺,制作出工艺水平领先的金银器,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便是典型代表。该器物既包含粟特风格元素,又融入了中国传统的仕女和狩猎题材,充分体现了丝路文明的融合。这类高水平金银器不仅作为宫廷用器彰显了唐王朝的实力,还可能作为外交礼品或贸易商品输

出至域外,使周边国家和地区通过这些精美的器物直观感受到唐代文明的先进性。唐代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核心引领地位由此得到进一步巩固,中原也因此成为丝路文化融合的重要枢纽。

4 总结与思考

何家村窖藏的金银器及其所蕴含的粟特元素,不仅仅是唐代物质文明的遗存,更是唐代对外开放、文化交流繁荣鼎盛的历史见证。这些器物既证明了粟特文化对唐代物质文明的深刻影响,也揭示了丝绸之路作为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作用,以及唐代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积极主导角色。

具体而言,出土的两件鸳鸯莲瓣纹金碗,以佛教写实意象为基础,通过双瓣莲花纹丰富了佛教艺术的内涵。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生动描绘了唐代宫廷生活场景,反映出了女性地位提升与艺术审美的变化。牛首玛瑙杯源自西方“来通”,象征着权力和财富,也是中国古代朝贡体系的表现。可以说,何家村窖藏金银器是粟特风格与中原文化融合的产物,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平台。

参考文献:

- [1] 韩森,高菲池.(2009)。唐代金银器:万里丝路与何家村窖藏.《美成在久》(02),32-43。
<https://doi.org/10.19993/j.cnki.2095-865x.2019.02.003>.
- [2] 王燕.(2015)。丝绸之路与粟特人.《黑龙江史志》(07),186。
- [3] 荣新江.(2004)。从撒马尔干到长安—中古时期粟特人的迁徙与入居。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 [4] 黄正建.(2004)。何家村遗宝和刘震有关吗?——与齐东方先生商榷.《考古与文物》(04),73-74。
- [5] 田卫丽.(2020)。从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谈唐代金银玉器的社会政治功能.《文物天地》(08),4-11。
- [6] E.H.Schafer.(1963).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a study of Tang exotics. Berkele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7] 文军.(2016)。何家村窖藏出土唐代金银器属性探讨——以莲花图案为例.《文博》(05),41-46。
- [8] 齐东方.(1999)。唐代金银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354。
- [10] 周叶青.(2020)。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文物天地》(08),36-39。
- [11] 吴杰.(2008)。镶金兽首玛瑙杯.《西部大开发》(03),73。
- [12] 齐东方,申秦雁.(2018)。花舞大唐春—解读何家村遗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67-170。
- [13] 林梅村.(2017)。唐武德二年 宾国贡品考—兼论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原为大明宫琼林库皇家宝藏.《考古与文物》(06),94-103。

作者简介: 居宇萌(2003.02—),女,汉族,江苏省扬州市,本科,研究方向:中国历史教育。